

善于开展社会调查研究

——读毛泽东的《关于农村调查》

□ 刘晓川



毛泽东既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开展调查研究的积极践行者。《关于农村调查》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于1978年在《中国妇女》杂志首次公开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982年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关于农村调查》是继《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之后对农村社会调查工作作出的进一步论述，蕴含了关于调查研究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调查研究的必要性：“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调查研究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他看来，科学认识和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要坚决摒弃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善于开展社会调查。例如，毛泽东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科学结论就是在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的。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写道：“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

毛泽东同时认为，调查研究之所以必要，还因为“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调查研究不仅要立足当下，

更要着眼未来。在毛泽东看来，“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只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做好调查研究，才能不断地认识新事物，获得新知识。

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对立统一”“详细地占有材料”

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以科学的方法作支撑。缺乏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其时效性和实效性就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因此，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十分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运用。

一是坚持对立统一，善于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联系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在什么领域，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包含着联系、矛盾的辩证关系，联系、矛盾的普遍运动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因此，开展调查研究，必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认为，“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浪费时间，一事无成。因此，“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根据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作出科学分析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估量。在民主革命时期，阶级矛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之一。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和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基本思想。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坚持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农村，才能对农村的各阶级以及各阶级的主要特点和相互关系作出科学地了解和把握，“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二是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调查的最终目标是发现和总结规律，产生新观点、新论断、新理论，进而指导实践。这就意味着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以丰富的材料为保障。因此，毛泽东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收集和具备丰

富的材料并不意味着科学观点、论断、理论的自然产生。要使材料在调查研究中发挥应有价值，还需要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系统地分析和整合，“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十样事物，“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调查研究的关键点：澄清模糊认识

开展调查研究，关键要保持思想认识上的清醒。对于一些党员干部提出的思想认识疑惑，毛泽东作出了科学回答。

在“怎样开调查会”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在“怎样找调查的典型”的问题上，毛泽东把调查的典型分为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类型，并提出“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在“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的问题上，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再用这些经验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在“怎样使对方说真话”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是否于他们有利”。因此，要把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牢固树立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观点，充分肯定密切联系群众对于做好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使人民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真意。

《关于农村调查》通篇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颜子（前521年—前481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位居孔门72贤之首，被后世尊为“复圣”。颜子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达到了“卓冠贤科、优入圣域”的境界。颜子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成就，与他的治学之道是分不开的。颜子的治学之道主要有以下方面。

潜心好学、锐意进取的精神

孔子认为在其众多弟子中能称得上“好学”的只有颜子一人。据《论语·雍也》记载，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曾问孔子，其弟子谁可以称为好学者？孔子回答说，有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也从不重犯同样的过错。孔子认为颜回好学上进，自颜回死后，已经没有如此好学的人了。《论语·子罕》记载：“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颜子对于孔子所教能够细心领会并付诸实践。仅闻孔子之语而不“内得于心”、不“外显于行”是“学之惰”的表现，而颜子却能闻孔子之教，得之于心而不惰于行，从“知道”到“载道”，最终至“行道”。以此观之，颜子不仅能“学而不厌”，而且能“行之不惰”，实属难能可贵。

颜子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求学精神。《论语》中多有颜子向孔子请教，如问仁、问道等等。颜子对于孔子之道，总是默识心通、勉力而行。《论语·子罕》记载：“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孔子对颜子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深表赞赏。

明睿潜纯、闻一知十的智慧

颜子生来聪明睿智、天资潜纯，但表现在外的却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在孔子弟子中，以能言善辩、智力超群著称的子贡独服颜子。当孔子问子贡对颜子的评价时，子贡对颜子的智慧高度赞扬。子贡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在孔子和子贡看来，颜子悟性极高，能够闻一知十、触类旁通，连他们二人也自叹弗如。

虽然颜子的天资极高，其智慧非常人可比，但是颜子虚怀若谷，具有包容广阔的胸襟和虚以下人的态度。曾子夸赞颜子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所以颜子能够像海纳百川一样充实自己、成就自己。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情怀

朋友关系是儒家五伦之一，儒家交友目的是“以文会友、以友辅

仁”。儒家提出了一系列交友的原则，主张交正直的朋友、讲诚信的朋友、有见识的朋友，而不主张交阿谀奉承、一味讨好自己的朋友，夸夸其谈而无真才实学的朋友。颜子始终秉承践行这些交友原则。

朋友应该是道义相砥之人、志同道合之人、肝胆相照之人。朋友之间应该如何相处，颜子曾就这一问题请教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非能谓‘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君子对朋友的错误一定要直言相告，而不能说不知道。铭记朋友以前的恩德，而忘记原先的怨恨，这就可以算得上仁人了。颜子用一生的行动践行孔子教导的“朋友之际”原则。

仰高钻坚、矢志不渝的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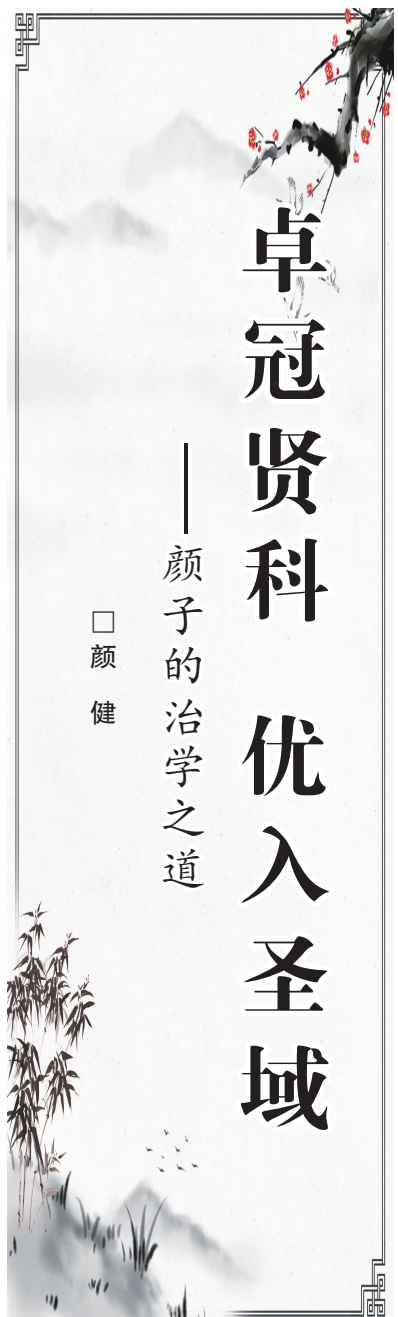
颜子对于孔子的学问极为仰慕，认为孔子之道越仰望越觉得高深，越钻研越觉得深厚。颜子赞叹孔子的学问，并且以此激励自己好学深思、学以致用。

颜子13岁从学于孔子，他比孔子年少30岁。《论衡·讲瑞》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孔子设教于杏坛之时，少正卯教于鲁城，与孔子争夺弟子。“唯”字说明除颜子之外，孔子的门人感于少正卯的巧言令色，多有离开孔子而去投奔少正卯之门。而颜子具有知圣之明，所以才会一心一意地追随孔子。在周游列国的14年间，无论匡地被围，还是陈蔡绝粮，颜子始终对孔子信任与追随。可以说颜子是以生命明志，生命不息、追求不止。颜子终其一生学习践行孔子之大道。

三月无违、克己成仁的追求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孔子发现，表面上看缄默无言、如同愚笨的颜子不仅对孔子讲授的知识融会贯通，而且能加以推广应用，深得孔子精髓。颜子处处向老师学习，言孔子之所言、思孔子之所思、行孔子之所行，是圣人的真实复现。

颜子是知行合一的典范。颜子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子说虽然自己不聪明，但是一定要依照孔子的教导去做。颜子是孔子仁学的忠实践行者。孔子称赞他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赞扬颜子能够以仁为安宅，内心长久不离于仁德，而其他学生只能在短时间内做到仁。孔子曾告诉颜子，许多人虽然知道他的“道”好，但并不愿意去实践这个“道”。其实，孔子的



“道”实践起来并不难，不过是“克己复礼”，努力按照上古圣人的教导去做罢了。颜子不仅知道孔子的“道”美，更知道如何去实践孔子的“道”，因而深得孔子赏识，成为孔门传道人之一。

总之，颜子是学以致圣的典范。通过颜子，我们知道：圣贤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君子。颜子之所以能够从孔子3000弟子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他学的是如何成为圣人、如何将圣人之道发扬光大。颜子以孔子为楷模、视禹舜为同道，天生具有承续圣学衣钵的潜质，具有发明至理、学以致圣的好学精神和统领圣学发展的志向与能力，故孔子一向对颜子寄予厚望。孔子最赏识颜子，颜子最敬仰孔子。孔子与颜子之间的师生情谊是古往今来师生关系的典范，值得人们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战中考，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精神的力量，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团结合作、守望相助、顽强拼搏、无私无畏、坚韧不拔、高风亮节……中国精神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中国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任何的现实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这本书对中国精神给出了深厚的解读、系统的梳理，使读者得见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深入了解5000多年来中国历史精神的所在。

中国历史精神是什么

中国历史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之精神。中国人的精神在中国历史的涤荡下积淀，历史合力形成中国人精神的凝聚，形成了中国历史精神。钱穆年少时，生长在亡国论甚嚣尘上的环境中，他自己也在黑暗中摸索，倍感压抑，直到看到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中国不亡论》使钱穆相信，中国不会亡，中国还有将来，中国还有前途。为了证明“中国不亡论”的正确性，钱穆努力去寻找证据，在历史的视野中，他不仅找到了中国不亡论的证据，而且找到了中国一定会有一个伟大光明前途的证据，这些证据便汇集成了《中国历史精神》这本书。全书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



——读钱穆的《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 师英杰

精神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历史精神的表现。中国历史精神影响着方方面面，作用于时时处处，已经渗透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之中。

中国历史精神有着截然不同于西方的表现，比如，政治上推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是文化的国家，在一统的道德与文化之上，崇尚学术，选贤与能，最终达到“富而好礼”。经济上，中国社会有“士”和“农”相配合的理想，官家、富人在更替流转，累积不成大富，却在某种限度内保持了贫富的相对平等。国防上，中华民族有着最深沉、最坚韧的和平精神，同时，也拥有强韧的战斗精神。中国历史上，外患入侵不断，但中国仍保留民族文化数千年，这与其坚强的战斗精神是分不开的。与其他一些民族不同的是，我们面对大胜利却能节制、友好。钱穆总结到：我们胜利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

不屈不挠，再图复兴。

历史是一种经验，历史也是人类生命的体现。中国历史本身广博、悠长。在5000多年浩浩荡荡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是沉淀下来的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史精神是我们的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

中国历史精神何以重要

中国历史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句话很好的说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精神的要义。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居安思危、履险若易的历史。鼎盛时期能保泰持盈，不为己甚。钱穆指出，“惟其能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履险而若易。惟其不作春风之得意，所以亦不面对严冬而丧气。”中华民族历经艰难险阻而安然不倒，凭借的就是此种精神。有了中国历史精神的支撑，中华民族才能

在各种险境中屹立无恙。

中国历史精神为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能够顽强地存活下来，并始终一脉相承。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正是有赖于这种精神，才能孕育出这悠久的历史；又是凭借中国历史精神，全民族形成了团结奋发的精神力量和拼搏进取的实践力量。中国历史精神带来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今日的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从一脉相传的中国历史精神中汲取营养，更加牢固和凝聚全体人民

的精神合力，坚定全体中华儿女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支撑和动力源泉。从中国历史精神的宝库中汲取智慧，让中国历史精神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懈动力。

中国历史精神传承靠什么

中国历史精神不是自然产生的，是文化陶冶而成，并依靠教育传承下去。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钱穆指出，“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把教育看得比中国更重。中国任何一派学术思想，莫不以教育哲学为其最高的核心。中国任何一学者，几乎全是个教育家。”比如，西方社会尊崇的是牧师、是耶稣，而中国社会尊崇的是“先生”，是老师、是圣人，孔子则被尊为“至圣先师”。

中国的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尊师重道，主

张“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道德人格的尊严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从而每个人的内心都可以得到安慰和满足。这种教育理念在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功效。正因为如此，我们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步思想，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信念不断创造奇迹。同时，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时时在转动，这造就了中国历史里的新生机运，钱穆对此明确指出，“在中国，各地区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的文化之贞下起元，层出不穷。因此中国文化是劲气内转的。”这种劲气内转的性质保证了中国文化“欣欣向荣、机运不绝”。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唱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它寄托着中华儿女的期望和憧憬。中国历史精神呈现了中国梦能够成为现实的根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立基之本。从中国历史精神的宝库中汲取智慧，在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中寻找方向，将个人理想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尽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这是新时代中华儿女对中国历史精神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中国历史精神最好的传承。

